

內部文獻與共和國史的研究

• 謝 泳

中國當代史研究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檔案解密尚未制度化，從而人為增大了研究的困難。這個困境的形成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特殊性相關，因為這一研究領域必然要與現實政治發生聯繫，而這一困境能否解除，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政治制度的變革。但學術總要發展，中國當代史的研究也不能因為遇到困難就停滯不前。本文擬就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內部文獻」的作用，尤其是「內部文獻」與公開文獻之間的史料互證問題，貢獻一點淺見。

目前還沒有關於「內部文獻」的積累，相關目錄索引也還沒有建立起來。在原始檔案使用困難的情況下，作為一種過渡性質的補充研究方法，由「內部文獻」和公開出版的文獻進行互證，可能會持續相當長時間，並成為中國當代史研究的一種常態。

陳寅恪曾經對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做過一個總結，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①。受此啟發，筆者想提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的史料「內外互證問題」。這裏的「內」係指介於原始檔案與公開出版文獻之間的「內部文獻」，典型者如新華社主編的連續出版物《內部參考》和中宣部秘書處主編的連續出版物《宣傳通訊》；這裏的「外」係指一般公開出版的文獻。

在以往的中國當代史研究中，使用「內部文獻」雖然已成為學者的一般習慣，但充分意識到「內部文獻」的重要性並在研究中建立完整使用這些文獻的意識，還不夠自覺。因此，目前還沒有關於「內部文獻」的積累，相關目錄索引也還沒有建立起來。在原始檔案使用困難的情況下，作為一種過渡性質的補充研究方法，今後一段時間內，這種由「內部文獻」和公開出版的文獻進行互證，可能會持續相當長時間，並成為中國當代史研究的一種常態。

「內部文獻」的形成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國所有的政治運動基本保留了一個傳統，就是針對運動中的被批判對象，都有較為完整的「批判言論集」或「罪行錄」保留下來。這些在當時都是「供內部批判」的，但時過境遷之後，這些資料有可能脫離當時的政治處境，而成為一種獨立的史料來源。由於當時整理和印刷這些資料的目的，主要是出於政治考慮，所以對所收集的材料通常難免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特點。也就是說，這些材料一般很難作為正面的史料使用，但

這不等於這些「捏造」的材料沒有史料價值。至少這些史料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線索，或者提供了一般情況下難為人所知的屬於私生活領域中的一些背景，這些材料有助於開闊研究者的思路，讓研究者意識到更複雜的歷史關係，這使得本來供「批判使用」的材料，在政治運動成為歷史後，獲得了另外的價值。另外，中共執政行為的一個特點是內外有別，同樣的歷史事件，在傳播時通常均要分為公開和內部，它的基本原則是「先內後外」、「內詳外略」。所以，對同樣的歷史事件，相對於公開文獻，「內部文獻」保留原初情況更完善，也較為接近真實的歷史狀態。

「內部文獻」一般包括相關的政策文件（如完整的會議簡報）、批判材料（如相關言論彙編），還有行政機關的內部出版物（如《宣傳通訊》）等。顧名思義，「內部文獻」通常以內部發行為主。雖然數量有限，發行有相關行政級別的限制，但相對於原始檔案的唯一性來說，它們有一定的存世量，而且分散在各處，對研究者來說，其獲取相對於原始檔案來說更為容易，具備成為系統性史料的前提。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保存的新華社《內部參考》，在近年中國當代史研究中的使用率很高，在提供史料線索、豐富歷史細節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在相關原始檔案不能自由使用的情況下，注意從這些「內部文獻」中獲取與研究對象相關的史料線索，可以拓展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史料來源。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機關主辦的內部工作期刊，很多「內部文獻」有穩定連續出版的特點，從保存史料的角度觀察，史料價值較高。例如，由於《內部參考》依靠各地記者及相關機構以情報方式向高層匯報情況，所以保留了相當豐富的內部材料，特別是當時不能在全國大報及省級報紙公開的材料。《內部參考》中經常有讀者給《人民日報》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為情況動態向高層匯報。所以作為史源，很多「內部文獻」的史料價值，也相對高於公開文獻。

下面筆者以三個例子來說明「內部文獻」在中國當代史研究中的價值。

一 毛澤東有沒有在「五一口號」中加寫「毛主席萬歲」？

李銳認為毛澤東在1950年起草的〈慶祝五一勞動節口號〉（「五一口號」）中加寫「毛主席萬歲」的依據是：1980年10月中共黨內四千高級幹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簡報。李銳指出：「這是1980年討論第二個歷史決議案時，朱德秘書陳友群親口說的，登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討論簡報〔中直第5組第32號，1980年11月17日〕上的。」^②

應該說，李銳提出的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它對深入研究毛澤東的思想極有啟發。郭道暉在〈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紀略〉中，首次公開了這個史料^③。但很快張素華依據1950年〈慶祝五一勞動節口號〉的原始檔案，否定了郭道暉的判斷^④。

中共執政行為的一個特點是內外有別，同樣的歷史事件，在傳播時通常均要分為公開和內部，它的基本原則是「先內後外」、「內詳外略」。對同樣的歷史事件，相對於公開文獻，「內部文獻」保留原初情況更完善，也較為接近真實的歷史狀態。

張素華依據的是原始檔案，因此一般可以判斷為定論。但在這個定論之外，如果我們還能引入相關「內部文獻」來印證張素華的判斷，就可以進一步加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而這樣的認識對於研究毛澤東的思想並非沒有幫助。

這個「內部文獻」就是《宣傳通訊》。這本1950年5月創辦的內部期刊，先由中宣部研究室主編，後由中宣部秘書處負責編輯，是一本32開的旬刊，當時的定位為「黨內刊物、絕對秘密」，發行範圍確定「發至地委及軍級止」^⑥。筆者本人所見者是由創刊至1955年的刊物，何時停刊尚不清楚。它的特點是除了保留相關重要的文件外，還刊登了大量當時的宣傳要點和工作

計劃，同時經常刊發意識形態部門對相關歷史事件的指導計劃和要求，比如對《武訓傳》的批判、對胡適的批判、對胡風的批判，以及清除托派的完整計劃等。

1950年5月10日出版的《宣傳通訊》，曾刊出該年4月23日制訂的〈中央關於紀念「五一」的方法和內容的指示〉，其中有在宣傳中要「依照中央所發口號」的要求，但這個通知中卻沒有刊出具體的「五一口號」^⑥，這不符合以往《宣傳通訊》刊載類似通知時的一般慣例。按張素華提示，毛澤東4月21日即修改了「五一口號」，而5月10日出版的《宣傳通訊》沒有刊出這個口號。按李銳文章中說法，似可推斷這個文件起草過程中可能存在複雜性，因為凡節日口號，當時《宣傳通訊》都要原文刊出。比如，《宣傳通訊》隨後發表了一個「八一口號」，有三十五條，極有可能是以「五一口號」為底本仿製過來的；其中第三十一至三十五條順序排列是：毛主席萬歲；朱德司令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⑦。

「八一口號」是附在《宣傳通訊》1950年7月〈中共中央與軍委關於八一建軍節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的指示〉後，另外單獨發出的，距離「五一口號」，時間只有兩個月。張素華援引檔案資料認為，劉少奇親筆改過的「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成了後來發表的正式「五一口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兩個月後制訂的「八一口號」中，為何沒有延續劉少奇的提法，卻還使用「毛主席萬歲」？如果這些文件都是胡喬木負責起草的，說明胡喬木在行文習慣中有他固定遵守的規則；而劉少奇的改動並沒有影響胡喬木的習慣，這說明胡喬木更了解毛澤東。這個事例，也可以互證李銳的說法，即毛澤東更喜歡「毛主席萬歲」這個說法。從《宣傳通訊》後來的習慣判斷，稱「毛主席萬歲」是常例，而劉少奇改動後的說法，可能是特例。

1951年7月7日出版的《宣傳通訊》刊載了〈中央關於「七一」刊像、掛像、唱歌辦法的規定〉，這個規定註明制訂時間是1951年6月。其中第一條規定：「一般報紙在一版右側刊毛、劉、周、朱照片，左側刊馬、恩、列、斯照片，均由上而下。」第二條規定：「紀念會場懸掛馬、恩、列、斯、毛、劉、周、朱八人照片，排為一行，由左向右（自台下看）。」^⑧



「內部文獻」——《宣傳通訊》

張素華指毛澤東於1950年4月21日修改了「五一口號」，而5月10日出版的《宣傳通訊》沒有刊出這個口號。按李銳文章中說法，似可推斷這個文件起草過程中可能存在複雜性，因為凡節日口號，當時《宣傳通訊》都要原文刊出。

到了1951年9月20日，《宣傳通訊》刊出〈中央關於慶祝國慶節辦法的通知〉，其中第三條卻規定：「慶祝儀式會場上，只掛毛主席像。遊行時領袖像的排列順序如下：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毛澤東、孫中山；第二排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第三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下是各國人民的領袖像，即朝鮮金日成、越南胡志明、波蘭貝魯特……」^⑩這條「慶祝儀式會場上，只掛毛主席像」的規定，可與李銳「毛澤東當年是要讓人歡呼他『萬歲』」的判斷互證。這些政治活動中特殊習慣的形成，很難說沒有毛澤東的自覺性。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自覺性，這些習慣也不可能以規則的形式固定在現實的政治活動之中。所以，即使否定了李銳提出該問題的證據，也還不能說李銳所提的問題沒有意義。

二 陳寅恪在批判胡適運動中的態度問題

眾所周知，1954年發動的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其深義不在批判俞平伯及其研究成果，而在清除胡適思想在中國知識界的普遍影響，用當時的話說就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1955年5月11日，中宣部給中央打了一個報告〈關於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這個報告對為甚麼要批判胡適分析得相當清楚，簡單說，就是胡適在中國知識界影響太大。這個報告同時還提到，除了胡適外還要注意批判三個人，一個是梁漱溟、一個是張東蓀，還有一個是張君勱。

6月，中央同意並批轉了中宣部的報告。批示中說：「中央同意中宣部《關於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現轉發給你們，望加研究，並據以指導本地的運動。」《宣傳通訊》恰好原文刊出了中宣部的這個報告^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收有毛澤東對這個報告的批示：「劉閱後照發。」該書的註釋中，對中宣部的報告有一個簡略的概述，但沒有原文附出。可以判斷為編者認為報告中有不適於當時公開的內容^⑫。筆者判斷是當時中央對陳寅恪的定性。

這個報告中特別提到，在批判胡適思想運動中：「個別的人，如中山大學教授容庚，則在去年12月的討論會上公開發言為胡適的『學術成績』辯護，並要求中大校刊發表他的發言稿（該刊發表了他的發言稿，並發表了批評文章）。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則更惡毒地污蔑這次批判運動，罵別人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⑬

中宣部報告來源於《內部參考》，因為引述原文相同，可以判斷為同出一個信息源。當時新華社記者在《內部參考》中曾提到，在中山大學，對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抱着不滿和抗拒態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其中特別提到了：「歷史系教授陳寅恪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都看過他的文章，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⑭陸鍵東指出：「一年後，這句話被校方註釋為『諷刺積極參加運動的那些人是共產黨的應聲蟲』。」^⑮可見，陳寅恪當時確實說過這樣的話。1954年底，陳寅恪還寫《無題》一首，再次對這一事件中許多人的態度表達了他自己的看法^⑯。

中宣部報告比新華社材料對陳寅恪的判斷更嚴厲，用了一個全稱的肯定判斷：「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則更惡毒地污蔑這次批判運動」。毫無疑問，這個判

中宣部報告比新華社材料對陳寅恪在批判胡適運動中的判斷更嚴厲，用了一個全稱的肯定判斷：「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則更惡毒地污蔑這次批判運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不公開這個報告的原因，筆者判斷是當時中央對陳寅恪的定性。

斷是中宣部起草報告時加上去的，新華社的材料中沒有這個提法。依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編輯慣例，如果是毛澤東修改的，編輯會特別註明，現在沒有註明，至少說明對陳寅恪說法的定性不是毛澤東加上去的，但毛澤東默認了報告中對陳寅恪的定性，如果不認可，毛澤東會將之刪除。

這個事例提醒人們，高層對許多歷史人物的判斷，其實主要依賴下層提供的基本信息，因為日理萬機的政治家不可能關心到很多事物的細部。如果中宣部在報告中不用「更惡毒地污蔑」，作為一般工作報告，也無不可，但如果用了，高層有可能不留意，就自然認可了，以後事情就會向壞的方面發生極大變化，有些小事就變大了。

現在的問題是，中宣部起草報告的公務員何以會對陳寅恪這樣仇視？如果不是出於這樣的態度，我們推測，就是起草報告的公務員這樣寫了，他們要報給胡繩秘書長（筆者判斷這個報告就是胡繩起草的），胡繩要報給周揚副部長，周揚要報給陸定一部長，而事實是在這個環節中，無人不是以「寧左勿右」的方式行事。在這三個環節中，本來其中任何一人都可按工作慣例自然刪除「更惡毒地污蔑」這幾個形容詞（這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且不需承擔太多政治上的風險，因形容詞的使用在例行公文中並不是必須的），但事實是沒有，而處在這個環節中的胡繩、周揚、陸定一對陳寅恪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這個事例以後可以與周揚、胡繩以及陸定一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態度互證。

整風轉向的深層原因，在檔案沒有解密前都是一種推測。筆者傾向於認為，整風突然轉向，其實是受到了當時蘇聯的壓力，而劉少奇、彭真對毛澤東原來的設想有不同看法，有可能利用蘇聯的壓力來逼迫毛澤東，使毛澤東最後做出了讓步。

三 關於中國反右運動的起源問題

中國反右運動的起源，目前學術界還說不清楚，因為看不到相關檔案。反右運動開始前的整風，現在看來確實是要讓人講話的，至於整風是預設的「陽謀」還是中途受到阻礙而突然轉向的，研究者可以見仁見智。最後結論，要看將來檔案的解密。筆者相信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因為反右是政黨的組織行為，而所有組織行為都有檔案。筆者個人的判斷是，毛澤東號召「鳴放」，一開始應該是真的，不然我們不好解釋他於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即後來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原初講話與後來的發表文章，意思是相反的，至於為何相反，學者可以有不同看法。

一般支持毛澤東「陽謀」說的研究者，主要根據是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起草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但這是一篇在二十年後才公開的文章（直到1977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才公開了此文^⑩）。文章原來的題目是〈走向反面〉，毛澤東改為此題時，特別註明「此文可登黨刊，但不公開發表」。此文原來的署名是「本報評論員」，毛澤東修改後為「中央政治研究室」。6月12日印發黨內時，毛澤東才將署名改為「毛澤東」。除了特別說明「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外，毛澤東還加寫了以下文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⑪

毛澤東原初講話的風采，不可能是先預設要「引蛇出洞」才那樣講的，因為這不符合常識。至於說毛澤東是感覺到有些人講話過頭，有引火燒身的危險才

出爾反爾，似乎也不合毛澤東的性格。整風轉向的深層原因，在檔案沒有解密前都是一種推測，何種推測更接近事實，我們只好期待未來。筆者傾向於認為，整風突然轉向，其實是受到了當時蘇聯的壓力，而中國方面劉少奇、彭真對毛澤東原來的設想有不同看法，有可能利用蘇聯的壓力來逼迫毛澤東，使毛澤東最後做出了讓步。朱正認為反右是文革的預演就是這個意思^⑩，反右期間香港也出版過一些類似的著作這樣解釋，筆者以為在邏輯上這個解釋有一定道理，因為後來發生了文革^⑪。

1957年，香港曾出版過名為《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和《鳴放革命實錄史》的兩種史料^⑫。

《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沒有單獨署名，是一本史論結合的著作，由於多數涉及的原始文獻沒有註明史料來源，一般較少為研究者注意。但從書中所敘述的史料分析，在敘述已知的事實方面，還比較真實。書中多次提到，材料來源於當時作者在北京任職的朋友。據此判斷，作為一本較早敘述中國反右運動的史料，此書還是有價值的。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該書第三章，在「鳴放變成反右派，毛澤東被鬥出走和回京」一節中，作者引述了幾個朋友的說法，認為毛澤東基於他自己對當時國際關係，特別是對蘇聯關係的了解和判斷，曾有過一個建立「新國際組織的秘密計劃」。在這個計劃中，以毛澤東為首，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陳毅及中共四老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外加李維漢和陸定一，共十人，組成一個「新國際中央小組」。書中認為：「這十個人都是共產黨中央重要而有力的人物，都是有名的國家主義共產黨的反舊國際主義者。因此，完全避去舊國際主義派的劉少奇等人，這是毛澤東決定實行『新國際』政治方向的堅決抉擇。」^⑬

毛澤東這個計劃的核心內容是取代蘇聯，使中國成為共產國際的中心。反右前的「鳴放」就是毛澤東實行這個計劃的一個步驟。但當這個計劃在進行中時，受到了蘇聯的壓力。書中指出，蘇聯領袖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等人，就乾脆用劉少奇等為代理人，制止這一行徑的發展，故於6月間發出一個明確的國際指示^⑭：

中國人民內部，究竟有何種矛盾，必須採取鳴放與整風。在目前的世界資本主義帝幫，對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環攻之下，我們的國際主義者的處境是特別危險的，一切問題也特別嚴重的，一切也要客觀的審慎，合一步伐，無論人民有何種內部的矛盾，此時的當前，皆不需要一個政治性的鳴放和整風。公開宣揚鳴放政策和整風運動，是給資本主義帝幫一個便利的襲擊我們。同時，也是無形中違害了國際主義，影響了國際團結。毛澤東同志的這種主張，犯了右傾思想，機會主義的錯誤，務必糾正這種右傾思想的發展，撲滅這種機會主義的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立即召集了黨內的國際主義派份子，如李立三、陳紹禹等人，建立一個「護黨戰線」，接受了蘇聯的上列指示，提出要與毛澤東為首的右傾思想和機會主義份子作嚴重的鬥爭，履行了蘇聯代理人的任務。

1957年香港出版的《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在敘述已知的事實方面比較真實。書中多次提到，材料來源於當時作者在北京任職的朋友。據此判斷，作為一本較早敘述中國反右運動的史料，此書還是有價值的。

毛澤東原初講話與後來文章的意思截然相反，這在學術界沒有爭議。現在我們不能聽原初講話的錄音，但可以根據「內部文獻」來互證毛澤東講話的大體情況。這個「內部文獻」是民盟中央秘書處主編的《民盟中央工作簡報》。

當時劉少奇是人大委員長，彭真是書記處書記和人大常委會的秘書長，劉、彭二人作了主動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的決定。彭真說：「鳴放是民主性的好政策，但是與黨的政治系列相反的，就被右派機會主義份子作了反黨的工具，黨應該要了解這個實際情況，應該要下最大決心，採取反右派的嚴格鎮壓。否則這個鳴放政策，就要危及黨的團結與生存。」^②劉少奇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見，並提出兩項建議：「1、將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時的秘密講話的有關各點，須加修正，予以公開發表，以免右派份子所利用和藉口，2、召開人大大會，公決右派份子的罪行，予以懲處，結束鳴放，以免影響國際與國內的糾紛。」^③

書中還提到了毛澤東對劉、彭意見的一些不同看法，同時還在「毛澤東出走時的托孤左右鬥爭」一節中，引述了毛澤東給周恩來的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我累年的辛勞，身感疲倦，需要易地休養，黨事不管，國事請你與伯特等四老共同研究，鄭重處理。」^④

不過，書中提到的細節可能多數是出於推測，有些時間、人物活動的空間也與真實歷史不符，比如書中說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前就離京出走，顯然不準確。另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修改情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薄一波的著作中有較為詳細的說明^⑤，可以印證該書的說法不準確。但該書對劉、彭作為的一些分析，還是有參考價值，特別是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對右派的批評確實非常激烈，而多數情況下毛澤東並不在場^⑥。

關於毛澤東的這個原初講話，現在我們沒有能夠用錄音來與文章對比，但這個錄音是有的，因為有人聽過這個錄音。從邏輯上說，拿出來放一遍，一切問題即可解決，但現在的問題是不能放這個錄音。毛澤東原初講話與後來文章的意思截然相反，這在學術界沒有爭議。傅雷寫給傅聰的信中對毛澤東的講話風采有詳細描述，舒燕也有過相關方面的回憶，章詒和的文章中還引述過章伯鈞在民盟（中國民主同盟）傳達這個講話的少量內容^⑦。也就是說，現在我們不能聽原初講話的錄音，但可以根據「內部文獻」來互證毛澤東講話的大體情況。這個「內部文獻」是民盟中央秘書處主編的《民盟中央工作簡報》。

據《民盟中央工作簡報》記載，章伯鈞在民盟中央常委會議上傳達毛講話時，有很多細節。章伯鈞在傳達中提到，毛澤東講到矛盾是永遠有的，我們就是生活在矛盾之中時說：「如在座的沈雁冰部長的筆名就叫茅盾。」講到如何管理大學，章伯鈞傳達到：「毛主席說，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消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請小平同志約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負責人談談如何治校的問題。」^⑧

當時民盟的沈志遠、曾昭掄還聽了中共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的錄音，並同樣在民盟作了傳達。《民盟中央工作簡報》中有詳細記載，沈志遠在傳達中用了一個標題：「放——大膽放手，全面開放」，曾昭掄傳達了當時康生、陸定一的講話，也是這個精神^⑨。如所周知，後來這三個傳達中共中央講話精神的人都成了右派。1957年6月18日，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一個在全盟開展整風的決定，這個決定中批判的對象，就是當時發表過言論的三個民盟領導人，即後來著名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

6月24日，民盟中央常委以「盟中央747號文件」形式，突然給各地市民盟發了一個緊急通知，要求立即撤消《民盟中央工作簡報》(第14、15、16號)中章伯鈞、沈志遠、曾昭掄的傳達。通知中特別強調，其中關於學校黨委制部分，傳達內容有嚴重錯誤^⑩。《民盟中央工作簡報》第16號上發表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上的講話，可能是周揚一生中最開放的講話^⑪。從民盟中央的突然變化中，可判斷一定是中共中央對整風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民盟才選擇了立刻轉向。有意味的是，當時身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居然也不明白中央的意圖。

另外一個旁證是，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決定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陳銘樞贊成毛澤東的這個選擇，而黃炎培、陳叔通認為中國不能沒有毛澤東。黃炎培、陳叔通選擇先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寫信，表示憂慮，主張慎重，而陳銘樞卻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贊成毛澤東退職，認為這是消除個人崇拜，是禮讓為國。陳銘樞的信惹惱了毛澤東，而黃炎培、陳叔通的信，卻給毛澤東留下了曲折表達他內心真實想法的餘地。

5月1日，陳叔通、黃炎培給劉少奇、周恩來的信中特別提到：「昨毛主席於會上最後提到下屆選舉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並囑我們透露消息。」毛澤東在陳、黃信上有幾處批示，其中一處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並且談到黨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⑫毛澤東還在信上特別說明：「請看末頁我寫的一段話及文中四處註解，都要印上。」^⑬這四處註解透露了毛澤東的一些心聲，其中一處說：「我仍存在，維繫人心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⑭

幾乎同一時間，在陸定一報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學校整風的情況簡報〉上，針對當時北京大學一個學生的文章〈我的憂慮和呼籲〉特別批示：「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⑮這個北大學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當時中共高層的分裂。綜合當時的一些歷史細節和文革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彭真的衝突，應該說，由「鳴放」到「整風」的突然變化，可能確實與中共高層的分歧有關。

以上關於這一歷史事件的史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有黃炎培、陳叔通給毛澤東的信及毛澤東的批示，但卻沒有收陳銘樞的信，但我們可以通過其他史源來尋找陳銘樞致毛澤東信的內容。

1958年12月16日，民盟中央召開過一個座談會，當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曾傳達了周恩來在12月15日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一次講話，這個講話內容完整刊登在當時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辦公廳內部出版的《中央工作通訊》上。

周恩來的講話是要向民主黨派解釋，中央贊成毛澤東的選擇，但同時又認為陳銘樞給毛澤東的信是「惡意污蔑」，但卻始終沒有正面公開陳銘樞的原信。周恩來說：「正在這個時候，右派份子利用黨整風，進行猖狂進攻。右派頭子陳銘樞於5月18日上毛主席書對主席進行惡意污蔑，造成主席退職，說是可以消除個人崇拜，是禮讓為國。陳銘樞和其他右派份子，在當時以為有機可乘，如毛主席退職，可以按照資產階級的辦法，來輪流坐莊。因此，在去年五、六、七月，忙於反右整風，毛主席所提出的意見，所以暫時只好不談。」^⑯

周恩來的講話，從國內國際六個方面分析，認為毛澤東退職的選擇時機是成熟的，顧慮是可以解釋的。但對黃、陳和陳銘樞二信的判斷卻是：「所以現在

對於從「鳴放」突然轉向「反右」的變化，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毛澤東的「陽謀」，起因是「鳴放」中知識份子的過激言論，但這個看法缺少內在邏輯。《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引入蘇聯的干預及毛澤東和劉、彭的矛盾，至少在邏輯上是一種解釋。

提起兩封信，很有必要。右派同我們是敵我矛盾，是懷有惡意的。黃、陳二老寫信，表示憂慮，是出於善意，但這種憂慮是暫時的。說到最後，主席的考慮仍然是正確的。」^③

毛澤東內心是真退還是假退？後來的歷史作了很好的說明。劉少奇、周恩來同意毛澤東退職，但還要講出許多「中國離不開毛主席」的理由，還是黃炎培、陳叔通更了解毛澤東，而陳銘樞則以假為真了。

在高層檔案尚不解密的情況下，結合後來中國歷史的發展，特別是文革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彭真的矛盾判斷，《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一書，對反右派運動起源的一些敘述，在部分推斷上，尚有相當的邏輯性。關於反右運動的起源，因為研究者看不到原始檔案，所以對於從「鳴放」突然轉向「反右」的變化，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毛澤東的「陽謀」，起因是「鳴放」中知識份子的過激言論。但這個看法缺少內在邏輯，因為對一個政治決策者來說，在決定「鳴放」以前，不可能對這一決策的後果沒有一點預期。引入蘇聯的干預及毛澤東和劉、彭的矛盾，至少在邏輯上是一種解釋，因為從「鳴放」到「反右」的時間判斷，確實是突然轉向，另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和發表稿的極大差異，雖然從文獻上看是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但有些觀點前後截然相反，卻很令人深思。

「內部文獻」的一個特點是流傳相對廣泛，比公開文獻少，但比原始檔案多，所以「內部文獻」中的史料相對豐富這個判斷大體可以成立。當然，此類文獻的存量有多大，如何獲取，如何加以判斷甄別等等，都是中國當代史研究中面臨的問題。

四 小結

「內部文獻」和公開出版文獻間的關係，我們現在還不能明確確定具體邊界在何處。原始檔案中通常包括「內部文獻」，但「內部文獻」的一個特點是流傳相對廣泛，比公開文獻少，但比原始檔案多，所以「內部文獻」中的史料相對豐富這個判斷大體可以成立。當然，此類文獻的存量有多大，如何獲取，如何加以判斷甄別等等，都是中國當代史研究中面臨的問題。筆者個人感覺，此類史料有相遇方知的特點，也就是說，我們從觀念上可以意識到此類史料的大理存在，但具體文獻狀態，我們只有看到實物才能判斷它的價值，所以希望學者能夠把自己研究中遇到的此類文獻及時公開出來，以便盡快完成學術史料的積累工作。

另外，此類史料在學術研究中如何公開使用，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則，如何將此類文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的相關規定協調起來，做到既合規則又有利於繁榮學術，也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不然當學者遇到某些危險的時候，學術共同體的援助就無法正當實現。

註釋

①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19。

② 李銳：〈關於「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頁64。下引不再另註。

③ 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紀略〉，《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頁1。

- ④ 張素華：〈毛澤東沒有在「五一口號」中加寫「毛主席萬歲」〉，《炎黃春秋》，2010年第7期，頁75-76。下引不再另註。
- ⑤ 《宣傳通訊》，1950年第1期，封面。
- ⑥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紀念「五一」的方法和內容的指示〉，《宣傳通訊》，1950年第1期，頁1、2。
- ⑦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與軍委關於八一建軍節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的指示〉，《宣傳通訊》，1950年第2期，頁6、8。
- ⑧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七一」刊像、掛像、唱歌辦法的規定〉，《宣傳通訊》，1951年第9期，頁2。
- ⑨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慶祝國慶節辦法的通知〉，《宣傳通訊》，1951年第19期，頁7。
- ⑩⑪ 中共中央：〈中央批轉中宣部《關於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宣傳通訊》，1955年第19期，頁38；39。
- ⑫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141、142；142。
- ⑭ 潘國維：〈中山大學的部分教授對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抱着抗拒態度〉，《內部參考》，1955年第282期，頁141。
- ⑮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134。
- ⑯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附唐筭詩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頁94。
- ⑰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23-29。
- ⑱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 ⑲ 謝泳：〈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搜集與評價〉，載章詒和編著：《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社，2007），頁325。
- ⑳ 中國人民二二七鳴放反共革命聯合會：《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香港：當代出版社，1957）；中國人民二二七鳴放反共革命聯合會：《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1957）。
- ㉑㉒㉓㉔㉕ 中國人民二二七鳴放反共革命聯合會：《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頁26；48；48；48；52。
- ㉖ 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 ㉗ 參見人民出版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彙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的相關代表發言。
- ㉘ 傅敏編：《傅雷家書》（北京：三聯書店，1984）；舒蕪口述，許福蘆撰寫：《舒蕪口述自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㉙ 民盟中央：〈關於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情況的傳達·沈志遠傳達部分〉，《民盟中央工作簡報》，1957年第14號，頁7。
- ㉚ 民盟中央：〈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擴大座談會傳達毛主席四月三十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盟中央工作簡報》，1957年第15號，頁1。
- ㉛ 民盟中央常委：〈中央常務委員會緊急通知〉（盟中[57]字第747號文件），1957年6月24日。
- ㉜ 〈中共中央宣傳部周揚副部長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上的報告〉，《民盟中央工作簡報》，1957年第16號，頁4-14。
- ㉝㉞㉟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457；457；459；493。
- ㊱㊲ 〈盟中央舉行座談會傳達周總理重要講話〉，《中央工作通訊》，第1號，1958年12月19日，頁1。